

# 「以案主最佳利益」看目睹暴力兒童的社工員角色與功能

杜瑛秋・張玉芳

## 壹、前言

不管是實務或研究發現，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不只是婦女本身，還包括直接目睹婚姻暴力過程或間接目睹暴力的孩子們，而這群孩子被稱為目睹暴力兒童（以下簡稱目睹兒）。在美國，推估每年約有三百萬至一千萬的目睹兒，1990年代開始意識並重視到家庭暴力的潛在受害者兒童，不但產生許多相關的研究，政府部門對相關的服務的支持也越來越多（Groves，2006）。

在台灣，依據內政部如以2009年內政部統計家暴通報屬於婚姻暴力有41684人，如以一個家庭有1.2名字女，推估至少有50020名目睹暴力兒童。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前，很少人意識到兒童在家庭暴力下創傷影響的議題，即使有也是針對婚暴

併兒虐問題提起討論（洪素珍，2003）。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後，隨著受暴婦女議題與需求被重視，少數民間團體開始提供目睹兒個別的服務（註一）；學者、政府部門也注意此議題，開始進行目睹兒的創傷影響相關研究及宣導。

「以兒童最佳利益」是兒童社工人員必須遵守的專業倫理與守則，也是許多專業社工員做為提供服務的基本信念，本文將探討目睹兒社工員在面對這一群無決定能力的案主群，如何秉持「以案主最佳利益」的原則發揮其角色與功能。

## 貳、兒童最佳利益相關概念

兒童最佳利益被認為和其權利、需要與福祉有密切的關係，而對於兒童最有利的安排涉及最能滿足兒童福祉的環境，

而兒童福祉是對於兒童權利的具體表現，Seaberg（1990）認為福祉的標準可能隨著認為兒童應具有的權利之增加而增加（黃鈺倫，2000）。

國內對於兒童最佳利益除了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條：「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規定外，也經常出現在法官審酌父母離婚對子女監護權的歸屬之判定原則，包含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兒童利益。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感情狀況。同時，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第43條對已發生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該子女。然而，實務上，常常發現上述的法令條文或原則會因著親權爭議、父權司法體系（審理保護令或離婚監護，很少考慮目睹兒童創傷和需要）、教育體系及專業主義等造成對兒童最佳利益的衝突。例如在親權爭議方面，許多專業人士都認為應重視施暴父親的親權，即使目睹兒童對於父親有極端的恐懼或害怕，仍需要維持其親子關係，進而強迫其接受

探視或輪流居住，甚至有審判法官只要遇到兩位以上兒童則採公平原則，同時裁判給父親與母親。但對於如何讓施暴父親停止施暴或提升親職功能卻束手無策。父權司法體系方面，法官在審理保護令或離婚監護，很少考慮目睹兒童創傷和需要。學校體系方面，多數學校只要施暴者父親不准受虐母親探視目睹兒童，學校便以受暴母親沒有監護權不准探視，即使受到父親施暴或疏忽，不准受虐母親帶走，只同意社會局帶走等。

## 參、從目睹暴力兒童創傷與影響來看服務的需求

家庭應該是兒童成長的安全堡壘，但對於目睹兒而言，卻非如此。許多研究顯示，兒童目睹最親密的母親被暴力對待，其所受的傷害不亞於受害的母親。目睹母親處於受虐情境下的兒童，會出現一切與創傷壓力症候群（PTSD）相似的焦慮、憂鬱、恐懼、無助感，以及攻擊、依賴、自我虐待、低自尊、遲鈍的情緒反應，和生理上的困難、不良睡眠習慣及不良社交能力等內隱行為，以及酗酒、藥物濫用、攻擊、學校等適應問題，以及家庭外的攻擊行為和犯罪事件等外顯的攻擊行為，且暴露在暴力的次數愈多，表現出心理—社會問題的可能性和嚴重度也愈高，

這些現象亦將影響兒童的道德發展、人際關係發展，及成年後可能產生健康上問題和複製暴力。此外，目睹兒會因其兒童的年齡、發展階段、性別、家中排序、受虐的經驗、親子關係、對衝突的覺知與評估能力等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沈慶鴻，2001；洪素珍，2003；Groves，2005）。兒童目睹婚姻暴力不僅對兒童直接的影響，對於父權和母權的角色、親職教育也會影響（陳怡如，2001；洪素珍，2004；Groves，2005）。實務發現，目睹兒不只目睹婚姻暴力才会有創傷和影響，當目睹兒需面對聲請保護令或離婚訴訟、或受害母親單獨離家、離婚後監護權歸屬施暴父親後與父親或祖父母共同生活等情形，容易讓目睹兒陷入受暴或疏忽的處境裡（例如毆打或不照顧目睹兒童逼迫離家母親回家、或強行帶目睹兒自殺懲罰受虐母親、或目睹兒童只要跟受虐母親聯繫便給予暴力或處罰），而受到更嚴重創傷和影響。

洪素珍（2004）研究發現目睹兒所認知的協助需求，不只是兒童本身需要人身安全、經濟安全、心理輔導協助，還包括受虐母親與施暴父親也需要上述三項協助。母親認為目睹兒童所需要的協助，不只直接的協助兒童，也包括協助與目睹兒童相關的重要他人，如母親、父親、兒童的老師，而可以提供協助的單位包括學校、社會福利、心理諮商與精神醫療、媒體與社會大眾。因此，如以目睹兒主體的

需求來看，要滿足其需求，與目睹兒童個別工作是不夠，還需透過與家庭成員工作（通常是主要照顧者）、與網絡成員合作、與社區工作才能達到其需求。

## 肆、目睹暴力兒童處遇服務

Groves（2004）指出要協助生活在暴力環境中的兒童有三個重要的原則，首先最重要的原則是，在幫助兒童從逆境復原的過程中，兒童與成人之間擁有一份滋養、尊敬且關懷的關係，其力量不可思議。第二個原則是允許兒童把自己目睹的一切說出來。第三個原則就是盡可能為目睹兒童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對於目睹兒的服務取向，Groves（2005）指出對受暴影響的兒童及家庭應採整合、系統的服務取向，當服務的系統能合作無間時，這些家庭能得到最好的而這系統首先必須提供安全保護的功能，並使施暴者能對其行為負起責任。在處遇策略方面，非施虐者家長（通常是媽媽）的積極參與，是兒童處遇的必要元素；處遇應減低危機、增加孩子的韌性、有彈性，並符合家庭所處的文化及社區脈絡的需要。由上述可見，目睹兒社工員要協助目睹兒童，需有滋養的專業關係或協助兒童獲得滋養關係，鼓勵並接納述說目睹情形與心理感受，以及要結合各網絡（社政、警政、司法、醫療、教育、社區）和非施虐家庭成員協助終止暴

力或降低暴力以提供安全生活環境。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體系有區分為婦保體系與兒保體系，早期對於目睹兒服務非常缺乏，除非目睹兒併同被虐(即婚暴併兒保)，進入兒保體系，否則大多數對目睹兒服務附屬於婦保體系服務。陳怡如(2001)指出在婦保機構中，常是在婦女主動帶其子女前來的情況下才可能接觸目睹兒童，並且以婦女為主的保護工作也是在有足夠資源才會擴及對目睹兒童提供服務，目睹兒童可說是婦保機構的隱形案主。在兒保機構中，目睹兒童常是以婚暴並兒保案的方式轉入兒保系統，在有限的資源環境下目睹兒童通常需要本身同時遭受虐待，才可能進入受虐兒童的服務方案，否則單純目睹父母婚暴可能因為界定困難而無法接受兒保服務，目睹兒童即成為兒保體系的次級案主。此種隱性與次級的特性導致目睹兒童處遇工作的邊緣化。

隨著目睹兒需要被看見，雖然各縣市政府家暴中心兒保服務仍無擴及目睹兒童服務，但最近幾年有越來越多民間團體以接受各縣市政府委託或中央政府補助方式投入以「兒童主體需求」從事目睹兒服務，包括勵馨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善牧基金會、幸福文教基金會、等，而這些民間團體分布在各縣市，有些縣市同時有3個民間團體(台北市、台中市)，卻也有不少縣市都沒有民間團體提供目睹兒服務。

對於目睹兒處遇模式，洪素珍(2003)在其「家庭暴力目睹兒處遇模式之探討研究—以兒童需求為導向」研究指出對於目睹兒處遇之工作應以三級預防、生態理論(個人、家庭、家庭外之支持系統及社會四大方向)的概念及不同專業分工進行。初級預防：對個人的服務、對家庭的服務、改善家庭以外的環境並增加支持系統、以全民的力量來建構平權的社會；二級預防：對個人的服務、警政與司法在次級預防中對個人的服務、各專業在次級服務預防中協助家庭增加外在的系統；三級的預防：對個體的服務、對家庭的服務、提升家庭外在支持系統之工作。依照洪素珍對於目睹兒處遇工作的三級預防處遇介入，目前各民間團體目睹暴力社工員對於目睹兒主要介入方式以第三級預防為主，而第三級預防目的在於協助目睹兒及其家庭可以控制因暴力而產生的傷害，試圖恢復個人及家庭殘存的心理社會功能，使之能扮演社會角色。

民間機構目睹兒社工員對於目睹兒都是秉持以目睹兒為服務主體，也強調與學校合作重要性，而所採取的服務方式大概可分為個案管理及個案工作兩種方法，前者目睹兒社工員擔任個案管理者進行服務計畫和服務項目的提供；後者(例如勵馨基金會)乃認為目睹兒受暴母親通常已有婦保社工員擔任個案管理，一個家庭不需要兩位個案管理者，所以目睹兒社工員



為個案工作者，除了提供目睹兒所需服務外，並強調與婦保社工員合作共同協助終止暴力或降低暴力頻率，以及進行各種聯合會談（親子、社工與案主），讓主要照顧者（通常為受暴婦女）瞭解目睹兒的需求外，也兼顧婦女與兒童最佳利益，避免產生利益衝突。而對於施暴父親部分，目睹兒社工員可能因目睹兒監護權在施暴父親身上進而與之接觸和工作。目睹兒社工員除了進行個案服務外，一般提供支持團體或遊戲治療團體增加服務成效，以及社區家庭暴力防治宣導。

## 伍、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員角色與功能

目睹兒社工員服務對象一般為十八歲以下直接或間接目睹家暴的兒童，但不包括已進入家暴防治中心兒保體系的目睹併兒虐的目睹兒。社工員協助目睹兒的角色與功能包括為人身安全評估與維護者、諮詢與教育者、諮商與輔導者、支持與陪伴者、親子關係促進者、資源連結者、權益爭取者、以及倡議者。

### 一、人身安全評估與維護者

對於持續與施暴者居住、或是訴訟中或是被裁定星期假日須返回施暴者家中輪流目睹兒而言，可能會有人身安全的風

險，包括在家裡被施暴或被疏忽的風險、在學校、在親戚家、在法院、隨母在外居住被找到強行被帶走。社工員必須經常評估目睹兒人身安全狀況，如有受暴母親也須納入評估，其如遇到高危機時則進行責任通報，並與受暴的母親或未受暴的一方（通常是已分開居住或離婚的母親）取得聯繫，討論因應策略，如果有婦保社工員協助也會經由母親的同意下共同討論解決方式，例如安置庇護、幫目睹兒聲請保護令、進行監護權假處分、秘密轉學等，同時社工員與目睹兒討論自我保護方式及求助方式並進行演練，以保護目睹兒人身安全。

### 二、諮詢與教育者

社工員不僅是主要照顧者、目睹兒，也是學校老師、目睹兒親人或施暴者的諮詢者及教育者。教育與諮詢內容有創傷反應、子女教養、親職教育、法律及訴訟過程、子女權利義務等。實務服務經驗中，大部分主要照顧者（通常為母親），可能因為本身受虐而無法立即發揮有效的親職教養或人身安全保護功能，卻仍能敏銳察覺或意識到兒童在目睹暴力後的行為或心理異狀來諮詢社工員，或者學校老師和親人不知如何協助目睹兒詢問社工員。社工員告知其目睹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層面、基本簡易辨識評估項目、目睹兒外顯及內隱行為與目睹暴力可能的關連性、如何因應目

賭兒需求、兒童發展階段、與目睹兒互動方式、社工員輔導方式等，增加主要照顧者或周遭親人對目睹兒的了解與認識，提升親職及照顧功能外，其也成為周遭系統間的正向支持。

實務經驗發現許多受暴婦女因覺察到目睹兒在家暴的創傷影響、無暴力生活環境重要而採取離開暴力環境或關係的行動，包括離家、轉學、聲請保護令、離婚訴訟、尋求家人協助婚姻問題商談等方式之下，所引發的子女權利義務行使、交往會面(主要照顧者受暴發生後至保護令尚未聲請核准之前、離婚商談或離婚案件審理期間等中間過度時期，目睹兒是否與施暴者會面？或目睹兒因施暴者阻止、無法與主要照顧者會面時，如何協助目睹兒爭取與主要照顧者會面或探視的權利？)等問題諮詢。社工員不僅針對主要照顧者說明子女權利義務的真實含義，重點更是著重直接與目睹暴力兒童進行子女權利義務行使的討論。許多學齡前幼兒、低年級兒童，甚至因長期目睹暴力而影響需求表達的兒童，其子女權利義務行使幾乎掌握在主要照顧者手中，若主要照顧者明確知道子女權利義務行使的重要性並且努力落實，目睹兒在過程間也能有機會將會了解主要照顧者對其的重視，不僅降低目睹兒對於父母分離後，自身處境不知會如何安排的焦慮感，安定兒童情緒也能有所幫助；再者，年齡較大或青少年期之目睹兒，社工

員本動說明其自身權益外，目睹兒童也會主動詢問如何終止施暴者暴力行為？

### 三、諮商與輔導者

許多目睹兒因目睹暴力產生創傷和影響，社工員須進行心理諮商和行為輔導。由於兒童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須運用媒材進行諮商與輔導，因此對於目睹兒的諮商與輔導依其年齡、表達能力，採取不同媒材了解其心理和情緒狀態、對於婚暴事件的解釋、問題解決方式、人際關係、兩性交往等問題及進行輔導。例如許多目睹兒認為父母婚姻暴力或離婚是自己造成，社工員輔導讓其了解與接受婚姻暴力或離婚是大人的事情，降低或消除其罪惡感。但是，這對於已脫離暴力目睹兒是有效，對於仍處在以管教子女作為施暴藉口的暴力環境之目睹兒很難發揮效果。

### 四、支持與陪伴者

有一個正向滋養的關係和接納安全述說其暴力的環境、人對於目睹兒是很重要的。社工員透過支持與陪伴和目睹兒建立一個滋養和接納關係，不但可提升目睹兒自我價值與自信心、降低恐懼、修復目睹兒對於大人不信任關係，也可讓其有正向角色示範，修正性別刻板印象。實務發現，目睹兒在父母採取法律行動時，可能必須面臨司法審理程序、再次目睹暴力等情況，期間社工員提供的服務功能有否

發揮，將會影響目睹兒童保護因子是否提升，及心理支持的深度。例如：是否因父母離婚或保護令案件結果尚未底定，目睹兒童須出庭作證，司法對於許多目睹兒相當陌生，何謂開庭？為何開庭？開庭時目睹兒以證人等身分出庭時，是否會在法庭內外與施暴者相遇？都會造成相當程度的緊張與不安，此時社工員在每次開庭前就與兒童進行法庭模擬、陪同出庭、開庭後的情緒安撫，達到支持與陪伴功能。

## 五、親子關係促進者

實務經驗發現婚姻暴力容易導致親子關係緊張、衝突或疏離。社工員需要協助目睹兒與主要照顧者親子關係修復或重建，除了透過個別會談、親子會談、舉辦親子旅遊促進親子關係外，還透過使用各種媒材教導示範主要照顧者與目睹兒互動的方式，促進親子關係。

## 六、資源連結者

社工員經常因目睹兒需要來進行的資源連結，並發掘和協助尋找支持目睹兒心理復原歷程、外在生活環境條件改善的資源，如：經濟補助勵馨基金會另提倡以聯合會談的工作機制，社工員在個案工作初始進行聯合會談，透過目睹兒主要照顧者、婦保個管社工、目睹兒社工三方共同會談商討，在以個案最佳利益前提下共同達成目睹兒處遇目標的共識，並在共識

擬定後促使婦保社工發揮個案管理功能，主導各項資源整合。目睹兒的需求需要主要照顧者協助滿足或發現，但主要照顧者因受暴而衍生的需求若未被重視或獲得處理，目睹兒的需求很容易因此未獲重視或忽略。因此社工員期待結合婦保社工員的資源，在提升受暴婦女復原力的同時，也能促使主要照顧者的功能正常發揮。

## 七、權益爭取者

社工員依目睹兒需要而替爭取權益，例如部分目睹兒不想在暴力環境生活期望受暴母親帶其離開或離婚，受暴母親則希望給目睹兒完整家庭而不願意離開。此時，社工員透過親子聯合會談協助目睹兒爭取無暴力生活環境的權益。另外，有關於監護權爭取，雖然有以子女最佳利益監護權的審判原則、訪視報告、子女出庭陳述其想要與誰生活機會及家暴法中推定施暴者不適監護的條文，但很多法官仍會依子女人數多寡、經濟因素及是否有身分證作為裁決，而未考量目睹兒照顧史、目睹家暴創傷情形及施暴者未治療。社工員須協助目睹兒與受暴母親爭取其權益，包括陪同出庭作證時協助目睹兒表達其想法、收集相關資料證明目睹兒目睹家暴的創傷與影響、主動提供評估報告作為佐證、等方式。

## 八、倡議者

社工員除了提供目睹兒直接服務外，發現大眾對目睹兒的了解和重視程度，也會影響了國家政府如何制定相關福利政策。社工員在接觸目睹兒過程中，最能快速從中發現目睹兒在世代間的影響力，喚起大眾對暴力議題認識的廣度外，藉由目睹兒議題，如代間暴力循環、權利與控制的複製等的倡議，增加大眾對目睹兒的誤解、刻板印象、迷思等有所釐清；也透過刊物、專業研討會議的參與，分享工作模式及經驗，讓提升更多專業人力的投入。

## 陸、結論與反思

家暴防治體系中仍以婦保、兒保兩大區塊為主，目睹兒服務附屬在婦保服務範圍內。從去年開始，政府開始推行一案到底垂直整合服務，婦保社工員在有限人力下，不僅進行有時間限制通報單追蹤，還需要提供個案管理服務，每位婦保社工員在工作量大增情形下，即可能花費高達七、八成時間和精力處理受暴婦女的危機問題和行政工作。目睹兒的問題往往都是受暴婦女危機過後才會被關注或浮現問題，婦保社工員在龐大工作量中，能否主動、有效評估，提供目睹兒協助或轉介仍需待觀察。

以案主最佳利益的目睹兒服務需要高度網絡服務。實務發現，有些服務目睹兒工作者雖然以兒童主體需求作為服務口

號，但實際上卻少與網絡成員合作（例如不與婦保社工員合作）、也不協助目睹兒爭取其權益（例如心理諮商在目睹兒及其助要照顧者同意下也不願意提供心理諮商評估報告）、也不與主要照顧者工作或家訪、校訪，以致於造成服務困難，實在可惜。另外，實務也發現，有些目睹兒社工員積極想要與網絡合作，但卻經常吃閉門羹，例如社工員徵求主要照顧者同意至學校訪視輔導目睹兒卻被拒絕、主動想與婦保社工員合作卻無回應。社工員只能盡其所能、各憑本事以及掌握資源的多寡提供服務，不僅目前服務範圍仍無法普及，在缺乏共識整合之下，目睹兒議題曝光率雖逐年提升，但大眾對此議題的重視和了解卻無明顯提升。

此外，目睹兒不僅是被暴力波及，也是司法制度下的受害者。以離婚訴訟為例，從地方法院審理判決後並非代表案件結束，在未收到司法院的判決確定書之前，地方法院審理後接續的是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之後則還有最高法院。離婚訴訟審理至終結期程以「年」為單位者不在少數，但依兒童發展考量，兒童的成長一但跨了年度將會有不同階段的發展任務和議題，學齡前兒童的發展甚至縮短為數月至半年不等為階段區分，且每個司法層級無論審理時間長短，對於目睹兒來說卻是不斷在各個發展階段重新經驗因開庭所引發的緊張與不安，而離婚訴訟中卻依法



明定為維持兒童最佳利益，酌訂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時需有多面向的考量，兩相對照之下，「兒童最佳利益」原則竟也模糊難辨。

最後筆者撰寫本文的同時，屏東縣的一則子女因對長期受虐、目睹家庭暴力而弑父的新聞如鄧如雯殺夫案的重現。鄧如雯女士無法忍受先生長期的施暴選擇殺夫，暴力背後權力控制的失衡，促使民間團體積極推動家暴防治法成立，然而家暴法實施十一年之後，一樣程度的恨意，持

刀者卻換成稚嫩的青少年面孔，實足是另一個體制檢討的震撼彈。

註一：當時民間團體提供給目睹兒服務主要為心理諮商或治療服務包括勵馨基金會蒲公英諮商中心、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善牧基金會、兒福聯盟基金會。勵馨蘭心家園（台北市政府委託）則針對隨受暴婦女進住之目睹兒單獨開案服務。（本文作者現為勵馨基金會研究專員；中區目睹暴力兒童社工員）

## 參考文獻

- 江季璇(2002)。兒童保護社工專業倫理與困境。社會工作倫理應用與省思。
- 洪素珍(2003)。家庭暴力目睹兒童處遇模式之探討研究-以兒童需求為導向。內政部委託研究。
- 包承恩、王永慈主譯(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
- 沈慶鴻(2001)。被遺忘的受害者-談婚姻暴力目睹兒童的影響和介入策略。社區發展季刊，94，241-251。
- 沈瓊桃(2005)。目睹婚暴暨受暴對青年長期影響及其保護因子。目睹暴力兒童及少年學術與實務交流研討會論文，90-133。
- 陳怡如(2001)。婚姻暴力目睹兒童處遇現況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94，252-267。
- 黃碧霞(2006)。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服務推動現況。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國際研討會，51-54。
- 黃佩儀(2005)。婚姻暴力目睹子女之家暴認知及其因應策略。私立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康淑華(2009)。目睹家庭暴力兒少之三級預防概念。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處遇社工培訓，1-5。
- 楊雅華(2006)。看見心傷兒目睹暴力兒童服務工作的困難與挑戰。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

作國際研討會，122-126。

羅吉希、陳麗如(2007)。象爸爸著火了。

劉小菁譯(2004)。孩子，別怕：關心目睹家暴兒童。

戴世玫、楊雅華、郁佳霖(2009)。看見心傷兒-實踐以目睹家庭暴力兒童為主體的服務。

追求公平正義社會，社會工作專業的挑戰研討會手冊，105－115。

Besty McAlister Groves(2006)。Establishing Systems Connections for Children Affected by Domestic Violence。目睹暴力兒童保護工作國際研討會，61-80。